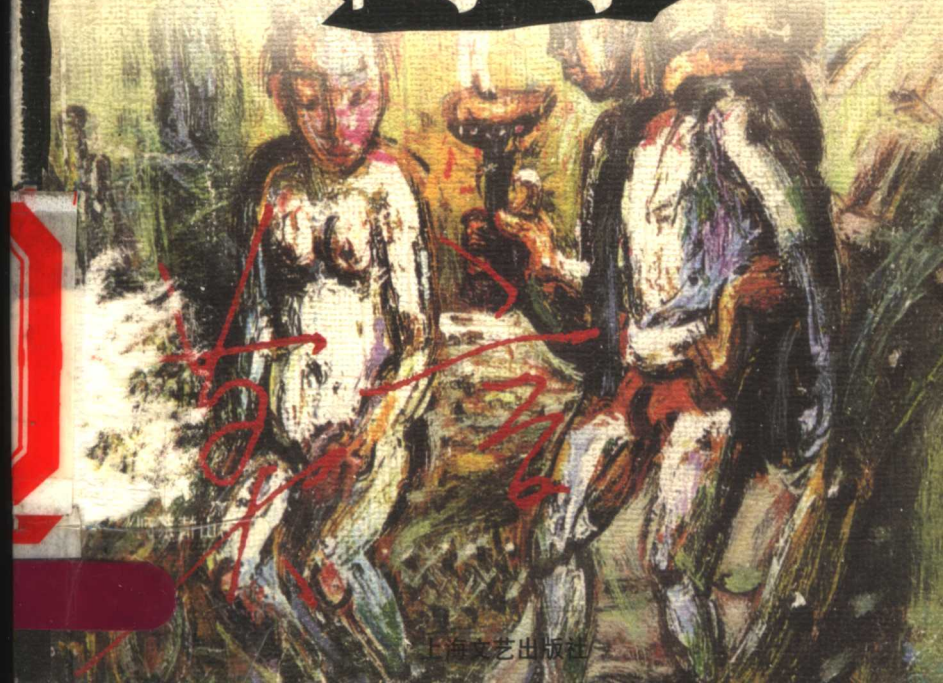


MOYAN

苍蝇

莫言小说精短系列

门牙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47.7/1306

莫言小说精短系列

苍蝇·门牙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7/05 莫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944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蝇·门牙/莫言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莫言小说精短系列)

ISBN 7-5321-2127-5

I. 苍… II. 莫…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330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封面设计:王志伟

苍蝇·门牙

莫言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7-5321-2127-5/1·1725 定价:16.00元

目 录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代前言）	1
大风	9
枯河	19
秋水	34
罪过	51
弃婴	78
拇指铐	105
飞鸟	128
草鞋窨子	140
售棉大路	158
五个饽饽	176
苍蝇·门牙	184
飞艇	209
粮食	227
灵药	239
铁孩	250
翱翔	263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 财富(代前言)

[2000年3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演讲]

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

从现在退回去大约四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那时候一方面是物质极度的贫乏,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另一方面却是人民都有高度的政治热情,饥饿的人民勒紧腰带进行着共产主义实验。那时候我们虽然饿得半死,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国人——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之中。而我们这些饿得半



死的人还肩负着把你们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神圣责任。当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对外敞开了大门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在我的童年时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照相这码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据后来看到过的一些历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忆,来想象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担保我想象出来的形象是真实的。那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烂程度是今天的中国孩子想象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她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没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人在险恶的环境里,也许会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不能适应的都死掉了,能够活下来的,就是优良的品种。所以大概地可以说,我也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那时候我们都有惊人的抗寒能力,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时,我们光着屁股,也没有感到冷得受不了。那时候你们如果到我们村子里去,一定可以看到一些或者光着屁股或者穿着单薄的破衣烂衫的孩子,在雪地里追逐打闹。我对当时的我充满了敬佩之情,那时我真的不简单,比现在的我优秀许多倍。那时候我们身上几乎没有多少肌肉,我们的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但我们的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隔着肚皮,可以看到里边的肠子在蠢蠢欲动。我们的脖子细长,似乎挑不住我们沉重的头颅。

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我们每天想得

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我的一个小伙伴后来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既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咬断,别的电工用刀子和钳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齿就可以完成了。那时我的牙齿也很好,但不如我那个当了电工的朋友牙齿好,否则我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电工而不是一个作家。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的香甜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吃了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阻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至于煤块吃到肚子里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里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不要以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还是有许多的欢乐。我们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

这样的饥饿岁月大概延续了二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每人每年可



以分到二百斤粮食,再加上到田野里去挖一点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人的生命,饿死人的事越来越少了。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体验得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当我成为作家之后,我开始回忆我童年时的孤独,就像面对着满桌子美食回忆饥饿一样。我的家乡高密东北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洼地里去放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眼睛蓝得好像大海里的海水。我想跟牛谈谈,但是牛只顾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

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什么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有一次我对着一棵树在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听到后大吃一惊,她对我的父亲说:“他爹,咱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后来我长大了一些,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进入了成人社会,我在放牛时养成的喜欢说话的毛病给我的家人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我母亲痛苦地劝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我当时被母亲的表情感动得鼻酸眼热,发誓再也不说话,但一到了人前,肚子里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说过之后又后悔无比,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导。所以当我开始我的作家生涯时,我自己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亲经常骂我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欢说话的毛病。为此我把文坛上的许多人都得罪了,因为我最喜欢说的是真话。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话说得越来越少,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我的作家梦想是很早时就发生了的,那时候,我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下放回家的学生。我与他在一起劳动,起初他还忘不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大学生,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但是严酷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很快就把他那点知识分子的酸气改造得干干净净,他变成了一个与我一样的农民。在劳动的间隙里,我们饥肠辘辘,胃里泛着酸水。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谈论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经吃过的或者是听说过



的美食讲出来让大家享受,这是真正的精神会餐。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直咽口水。一个老头给我们讲当年他在青岛的饭馆里当堂倌时见识过的那些名菜,什么红烧肉啦,大烧鸡啦,我们眼睁睁地望着他的嘴巴,仿佛嗅到了那些美味食品的味道,仿佛看到了那些美味佳肴从天空飘飘而来。那个右派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我开始创作时,的确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动机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许多中国作家那样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灵魂工程师”,更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改造社会。前边我已经说过,我创作的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对于美食的渴望。当然在我成了名之后,我也学着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那些话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中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鸟叫什么调,什么作家写什么作品。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当



然随着我的肚子渐渐吃饱,我的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的职责。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是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优点还是我的缺点,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

我最早的创作是不值一提的,但也是不能不提的,因为那是属于我的历史,也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我记得我写的最早的作品是写一篇挖河的小说,写一个民兵连长早晨起来,站在我们的毛主席像前,向他祈祷,祝愿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那人就起身去村里开会,会议决定要他带队到外边去挖一条很大的河流。他的女朋友为了支持他去挖河,决定将婚期往后推迟三年。而一个老地主听说了这个消息,深夜里潜进生产队的饲养室,用铁锹把一匹即将到挖河的工地上拉车的黑骡子的腿给铲断了。这就是阶级斗争,而且非常的激烈。大家都如临大敌,纷纷动员起来,与阶级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河挖好了,老地主也被抓起来了。这样的故事今天是没人要看的,但当时中国的文坛上全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这样写,就不可能发表。尽管我这样写了,也还是没有发表。因为我写得还不够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们的毛主席死了,中国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文学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变化是微弱而缓慢的,当时还有许多的禁区,譬如不许写爱情,不许写共产党的错误,但文学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压抑不住的,作家



们挖空心思,转弯抹角地想突破禁区。这个时期就是中国的伤痕文学。我是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那时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的禁区几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许多作家都介绍了过来,大家都在近乎发疯地摹仿他们。我是一个躺在草地上长大的孩子,没上几天学,文学的理论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我凭着直感认识到,我不能学那些正在文坛上走红的人的样子,把西方作家的东西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我认为那是二流货色,成不了大气候。我想我必须写出属于我自己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不但跟外国的作家不一样,而且跟中国的作家也不一样。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恰恰相反,我是一个深受外国作家影响并且敢于坦率地承认自己受了外国作家影响的中国作家,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作为一个专门的题目来讲。但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摹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我想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实际上是一次对话,甚至是一次恋爱,如果谈得投机,有可能成为终生伴侣,如果话不投机,就各奔前程。

截止到目前,在美国已经出版了我的三本书,一本是《红高粱家族》,一本是《天堂蒜苔之歌》,还有一本就是刚刚面世的《酒国》。《红高粱家族》表现了我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苔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我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我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三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 风

学校里放了暑假,我匆匆忙忙地收拾收拾,便乘上火车,赶回故乡去。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前些天家里来信说,我八十六岁的爷爷去世了。寒假我在家时,老人家还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想不到仅仅半年多工夫,他竟溘然逝去了。

爷爷是个干瘦的小老头儿,肤色黝黑,眼白是灰色,人极慈祥,对我很疼爱。我很小时,父亲就病故了,本来已经“交权”的爷爷,重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率领着母亲和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爷爷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庄稼人,推车打担、使锄耍镰都是好手。经他的手干出的活儿和旁人明显的两样。初夏五月天,麦子黄熟了,全队的男劳力都提着镰刀下了地。爷爷割出的麦茬又矮又齐,捆出来的麦个子,中间卡,两头耷,麦穗儿齐齐的,连一个倒穗也没有。生



产队的马车把几十个人割出的麦个拉到场里，娘儿们铡场时，能从小山一样的麦个垛里把爷爷的活儿挑出来。

“瞧啊，这又是‘蹦蹦’爷的活儿！”

娘儿们怀里抱的麦个子一定是紧腰齐头爹根子，像宣传画上经常画着的那个扎着头巾的小媳妇怀里抱的麦个子一样好看，她们才这样喊。

“除了‘蹦蹦’爷谁也干不出这手活儿。”娘儿们把麦子往铡刀下一送，按铡的娘儿们一手叉腰，单手握紧铡刀柄，手腕一抖，屁股一翘，大奶子像小白兔一样跳了两下，“嚓”，麦个子拦腰切断，根是根，穗是穗。要是碰上埋汰主儿捆的麦个子，娘儿们就搜罗着最生动形象的话儿骂，按铡的娘儿们双手按铡刀，奶子颠得像要插翅飞走，才能把麦个子铡断。而麦根部分里往往还夹带麦穗。

干什么都要干好，干什么都要专心，不能干着东想着西，这是爷爷的准则。爷爷使用的工具是全村最顺手的工具。他的锄镰镢锹都是擦得亮亮的，半点锈迹也没有。他不抽烟，干活干累了，就蹲下来，或是找块碎瓦片，或是拢把干草，擦磨那闪亮的工具……

我带着很悒郁的心情跨进家门，母亲在家。母亲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多年的操心劳神使她的面貌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母亲说，爷爷没得什么病，去世前一天还推着小车到东北洼转了一圈，割回了一棵草。母亲从一本我扔在家里的杂志里把那株草翻出来，小心地捏着，给我看，“他两手捧回这棵草来，对我说，‘星儿他娘，你看看，这是棵什么草？’”说着，人兴头得了不得。夜里，听到他屋里响了一声，起来过去一看，人已经不行了……老人临死没遭一点

罪,这也是前世修的。”母亲款款地说着,“只是没能侍候他,心里愧得慌。他出了一辈子的力,不容易啊……”

我眼窝酸酸地听着母亲的话,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家房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胶河,沿着高高的窄窄的河堤向东北方向走七里左右路,就到了一片方圆数千亩的荒草甸子。每年夏天,爷爷都去那儿割草。离我们村二十里有部队一个马场,每年冬季都收购干青草喂马,价钱视草的质量而定。我爷爷的镰刀磨得快,割草技术高,割下来的草干净,不拖泥带水。晒草时又摊得薄,翻得勤,干草都是很新鲜的淡绿色,像植物标本一样鲜活,爷爷的干草向来卖最高的价钱。我至今还留恋在干草堆里打滚的快乐——尤其是秋天,夜晚凉凉爽爽,天上的颜色是墨绿,星星像宝石一样闪闪烁烁,松软的干草堆暖暖和和,干青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甜香味……

最早跟爷爷去荒草甸子割草,是刚过了七岁生日不久的一天。我们动身很早,河堤上没有行人。堤顶也就是一条灰白的小路,路的两边长满了野草,行人的脚压迫得它们很瑟缩,但依然是生气勃勃的。河上有雾,雾很重,但不均匀,一块白,一块灰,有时像炊烟,有时又像落下来的云朵。看不见河水,河水在雾下无声无息地流淌,间或有泼刺的响声,也许是因为鱼儿在水里动作吧。爷爷和我都不说话。爷爷的步子轻悄悄的,走得不紧不慢,听不到脚步声。小车轮子沙沙地响。有时候,车上没收拾干净的一根草梗会落在辐条之间,草梗轻轻地拨弄着车辐条,发出很细微的“劈劈劈劈,叮叮叮叮”的响声。我有时把脸朝着前方(爷爷用小車推着我),看着河堤两边的景致。高粱田、玉



米田、谷子田。雾淡了些，仍然高高低低地缠绕着田野和田野里的庄稼。丝线流苏般的玉米缨儿，刀剑般的玉米叶儿，刚秀出的高粱穗儿，很结实的谷子尾巴，都在雾中时隐时现。很远，很近。清楚又模糊。河堤上的绿草叶儿上挂着亮晶晶的露水珠儿，在微微颤抖着，对我打着招呼。车子过去，露珠便落下来，河堤上留下很明显的痕迹，草的颜色也加深了。

雾越来越淡薄。河水露出了脸儿，是银白色的，仿佛不流动。灰蓝的天空也慢慢地明亮起来，东方渐渐发红，云彩边儿是粉红色的。太阳从挂满露珠的田野边缘上升起来，一点一点的。先是血一样红，没有光线，不耀眼。云彩也红得像鸡冠子。

天变得像水一样，无色，透明。后来太阳一下子弹出来，还是没有光线，也不耀眼，很大的椭圆形。这时候能看到它很快地往上爬，爬着爬着，像拉了一下开关似的，万道红光突然射出来，照亮了天，照亮了地，天地间顿时十分辉煌，草叶子的露珠像珍珠一样闪烁着。河面上躺着一根金色的光柱，一个拉长了的太阳。我们走到哪儿，光柱就退到哪儿。田野里还是很寂静，爷爷漫不经心地哼起歌子来。

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

一杆枪杀败了天下好汉

曲调很古老。节拍很缓慢。歌声悲壮苍凉。坦荡荡的旷野上缓慢地爬行着爷爷的歌声，空气因歌声而起伏，没

散尽的雾也在动。

一碗酒消解了三代的冤情
一文钱难住了盖世的英雄

从爷爷唱出第一个音节时，我就把头拧回来，面对着爷爷，双眼紧盯着他。他的头秃了，秃顶的地方又光滑又亮，连一丝细皱纹也没有。瘦得没有腮的脸是木木的，没有表情。眼睛是茫然的，但茫然的眼睛中间还有两个很亮的光点，我紧盯着这两个光点，似乎感到温暖。我想，他大概把我、把他自己、把车子、把这还没苏醒的田野全忘却了吧？他的走路、推车、歌唱都与他无关吧？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像很远很远的树上有一个啄木鸟在凿树洞……

一声笑颠倒了满朝文武
一句话失去了半壁江山

爷爷唱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我从爷爷的歌唱中感受到一种很新奇很惶惑的情绪，“小鸡儿”慢慢地翘起来，很幸福又很痛苦。我感到陡然间长大了不少，童年时代就像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爷爷用他的手臂推着我的肉体，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一直向前走。

“爷爷，你唱的什么？”我捕捉着爷爷唱出的最后一个尾音，一直等到它变成一种感觉消逝在茵茵绿草叶梢上时，我才迷惘地问。

